

ZHENGZHONGJIXUEDE
JICHULILUN
CHUANGXIN
邓本愚◎著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内涵是人类社会集合整体劳动力

一元的社会生产力理论是一元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来演化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ZHENGZHONGJIXUEDE
JICHULUN

INGXIN

邓本愚◎著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内涵是人类社会集合整体劳动力

一元的社会生产力理论是一元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来演化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邓本愚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17-8403-5

I. 政… II. 邓… III. 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48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牛慧珍 (电话: 010-68355210 E-mail: niuhuizhen@yahoo.com.cn)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任燕飞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印 张: 28.75

字 数: 5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7-8403-5/F · 739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序

这部著作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副总编魏氏先生和牛慧珍编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就拙著的书名做一点说明。在本书完稿时，我将其命名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这或许会被人误解为借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自吹自擂，但我仍然是难以舍弃。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不能无视自己在书中表述的批判性内核（当然，这里的“批判”与“文革”时滥用的“批判”之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其次，书中极力阐述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念，不仅可用于在当代仍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而且也是适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广义政治经济学所必须面对的基础理论问题分析的。此后，出于学术环境方面的考虑，改用了现书名。然而我相信，当读者了解了本书的观点内涵之后，会对著者欲以“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书名的做法有所理解。

当然，我完全可以预料，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自学者，竟妄图做一个如此宏大的政治经济学题目，也许立即就会得到专业人士或学者大家的五字评语：无知者无畏！不过，我还是诚恳地希望，任何可能的批评者，先哪怕是草草地浏览一下本书的内容（比如说，翻阅一下本书的前言或者是后记中的综合内容）之后再作论断。

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能借助于“抽象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员，往往无法进行直接意义上的协作分析或者说联合攻关。正是基于这一点，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也许总是或者说只能做一个孤独的攀登者。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切身体验。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十年“文革”的动乱期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是在阅读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范本的诸多教材中培养起来的。进入工厂后，我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其逻辑严密的推演和诙谐有趣的文风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年轻的求知者。人类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唯一源泉的劳动价值论观点，也从此根植于我的脑海中。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给众多的求知青年提供了深造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并没有参加头两次高考。直到1979年，在同事范君的鼓励下，经过几个月的业余时间准备，我才以28岁的“高龄”（这也是当年考生的最高限制年龄）参加了一次高考。结果按现在的说法是差了几分未达线。这对于一个仅在十几年前上过两年初中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后来，我考了电大，最终拿到了一个汉语言文学的大专证书（首届电大文科没有设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专业）。其间，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爱好有增无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只能作为一名自学自研的独行者去探索高深莫测的政治经济学殿堂时，首先面临的就是对钻研途径的选择问题。在将自己已学的知识与现实环境做了多方思量之后，我首先把探究物价水平呈长期上升趋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作为自己的追寻目标。

此后数年间，我一方面较为系统地了解了国内外有关物价问题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则更加深入地研读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在这一过程中，我更加坚定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物价水平呈长期上升趋势是一种客观的世界性现象。

第二，对这一现象的流行解释，从理论上讲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冲突的。

第三，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对这一世界性现象从根本上进行研究分析，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空白点。

关于最后一点，近年有著作介绍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列塔的观点，认为其“在解释通货膨胀现象时严格地运用了劳动价值论。”^①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在思索与探究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简单地运用已有的劳动价值理论去解释物价水平呈长期普遍的上升趋势，尚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基础理论欠缺。在能够弥补这些基础理论方面的欠缺之前，是不宜奢谈什么“严格地运用了劳动价值论”解释物价水平呈长期上升趋势这一世界性客观现象的。

当然，解决这类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的欠缺问题，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认为无法运用劳动价值理论去解释物价长期呈上升趋势这一世界性的客观现象，这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地位。其二是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肯定能对这一极其重要的客观经济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而且这种理论解释必将具有巨大的实践意

^① 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87。

义,但要想取得这一成果,必须先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些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予以创新。很显然,第一种选择是一种简单轻松的放弃,而第二种选择则意味着长期的艰苦探索,这也是我坚持至今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带来的只是一道逐渐增强的冲击波,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政治巨变,则是拍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狂涛。在剧烈变动的政治、经济现实面前,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如何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最终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了经济学领域;但也有一些坚持不懈者仍然不放弃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穷究与探索,我也将自己列入了这个“冥顽不化”的队伍之中。

匆匆地,近二十年又过去了,我的满头黑发如今已化成银丝,而自己的研究范围也早已突破了当年的起步目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向读者奉上此书。我自认为在这部非专业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当然,我也深深地知道,“按照惯例,一部提出新颖见解的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它出自一个著名作家的笔下因而得到一种支持,就不会引起什么反响。”^①然而,不论本书的最终命运如何,至少有一点,我可以毫无愧疚地坦言:这里面凝聚着自己近三十年的真诚追求。

此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构成作者整个著述计划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也相信,书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研究者、爱好者所饶有兴趣的。若客观条件允许,我将在本书以后的补述著作中,对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进行一些理论评析,同时阐发一些由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引申出的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实践政策分析意见,并最终将自己对世界性的物价水平长期上升趋势的理论解释奉献给读者,这样才能算作有始有终,当然,如果可能的话。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预先予以说明:

第一,与目前通行的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作为同义语运用不同,我们认为,虽然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在现实中确实有着难以区分的联系,但从理论上讲则是两个必须予以明确区分的不同概念。

第二,本书中所论及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也是指两个不可随意混淆的学科。因此,我们这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一部政治经

^① [美]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2001: 145.

济学著作，而不是一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混合式的著作。为了明确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首先简要地谈论一下自己对政治经济学与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之间的区别、联系和与此相关争论的看法，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前言。

邓本愚

2007 年 10 月

前 言

自马克思之后直至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发生政治剧变之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大多把西方的经济学视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政治巨变之后，西方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不仅日渐衰退，甚至连学科的名称也似乎难以保留了。

在我国，各类西方经济学著作、教材也已经充斥于书市和大学校园之中，而一些曾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其中不乏名人大家），近年来也纷纷将其所著的书籍、文章冠以经济学的大名。即使是那些仍然坚持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宣称：“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一类的书籍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①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经济学”。然而，这与取消政治经济学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方面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却又声称自己要坚持研究政治经济学，这样能有所创新吗？

从各类冠以政治经济学名称的书籍中也可以看出，其许多内容与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有的论者仅仅从文字名称上来理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无味的事情，因为这种解说的前提，实质上仍是把两者视为一回事，只不过是用什么名称合适而已。因此，

^①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

另，2005 年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我国著名学者刘国光先生也认为：“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见《刘国光旋风实录——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讨论》（总顾问王忍之，主编刘貽清、张德勤）第 6 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2006 年 5 月第一版。

关于名称的争议与这两门学科本质区别的定性是毫不相干的。

我们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能否廓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一个影响到政治经济学发展甚至是存亡的关键所在。任何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都应该辨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以往人们在谈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时,往往专注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有关研究对象的争辩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说到区别,无非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经济学则是研究生产力及与此有关的稀缺资源配置。然而事情仅仅是这样简单吗?政治经济学难道就不研究生产力和资源配置?西方的经济学难道就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此类问题谁也无法判定,争辩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近年来,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又渐渐地转向,认为政治经济学也研究生产力以及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等曾被传统政治经济学排斥在外的问题。不过这样一来,显然是无法从研究对象上来区别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了。

我们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看,要想正确地阐述其与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就应让自己的论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结论应适用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比如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应适用于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当然,伪政治经济学除外)。

第二,结论应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整体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借助于个别经典作家的论断性词句上。

第三,用于两门学科区别的结论,必须是泾渭分明的,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应是其独有而经济学所不具备的,反之亦然。

既然我们不能借助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来界定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本质区别,那么我们就不妨换个角度来开拓自己的思路:能否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方面来分析两者的本质区别呢?当然,这必须先界定两者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讲,什么是其主要研究目标,我们尚未能见到过对此有着明确论述的文章(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所致)。不过,恩格斯的一段话倒是以“任务”的形式对此有所描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

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① 下面让我们试分析一下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主要目标论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论的变换说法，而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标就是研究生产关系，对此可以见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看法是，生产关系目标说（对象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又是为了什么？也许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研究生产关系是为了指导人们的政治经济实践。但这实际上已经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了。此类回答几乎可以套用于一切科学理论，因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认为，研究生产关系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科目标，而只是达到主要目标的一种认识途径，沿着这种途径追究下去我们才能真正地揭示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于经济学的主要学科目标。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曾明言，其写作《资本论》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设问：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为了什么呢？对此的直接答案可以表述为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或者说无产阶级受资本剥削的根源。然而，揭示这些秘密或根源又是为了什么呢？排除解放全人类之类口号式的答案，我们只有综观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才能予以明确的回答：马克思所做的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②

同样的问题，我们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可以找到回答。当然，这种答案并不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中表现得那样明显。比如，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按照权威经济学家的说法：“亚当·斯密提出了将贸易和工业从封建贵族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学说。”^③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即将开始最终取代封建主义这一历史时期，斯密通过其“革命学说”，批判了封建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进行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18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255.

③ [美]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1.

造性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其通过《国富论》中的阐述，实际上回答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用科学的理论分析证明：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地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此之前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则是：用怎样才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致富的理论分析证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认为，以上两个看似不同的研究目标，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反映。因此，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抽象出一般的或者说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要研究目标：阐发人类社会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未来发展变化趋势。

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要研究目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时间是漫长的。也就是说，这个目标所涉及到的“未来”，并不是指从研究者往后的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国富论》发表已有两百多年了，但就整个人类社会来看，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仍不鲜见；《资本论》诞生已有一百多年了，然而实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切都说明了研究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第二，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变化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作为众多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不仅局限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还必须限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方面，即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演变的角度去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迁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去纠缠个体、微观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细小变化。

不过，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虽然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为主要研究目标，但却不需要预言家。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比比皆是的是预言家，实际上往往只不过是“空谈者”的代名词而已。即使是那些罗列了众多的史实与现状，并对其进行道德抨击，而且还往往提出自己理想（预想）的“巨著”，事实上也大多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价值。愤怒可以出诗人，但却难以产生科学的理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

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① 我们看到，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往往将马克思称为预言家，也许其并不是有意地贬低马克思的理论成就，但至少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目标缺乏了解所致。

当然，学者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解析人类社会的未来，更主要的是为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只不过是研究者的一个个人目的，与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然不能随意地予以混淆、代替。

至于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若按经济学家的话说，那就是“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② 从这一简单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这里的“世界”，在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中提出，当然主要是指社会上的各类经济活动现象。

第二，所谓的“身边”，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实际上更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身边”发生的事，一般只是指即时或近期所发生的事，所以“身边的世界”可以理解为现在或曰现当代所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现象。

第三，为现当代各种经济现象提供“解释”，正是众多经济学研究者所一贯追求的目标，从以上简捷的目标表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经济学研究（主要目标）的这一特点。至于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基于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③，则只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问题，与经济学的学科研究目标是不应该予以混淆的两码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再对比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学科主要研究目标，就可以发现两者具有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目标研究重点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偏重于政治方面，比如说将人类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突出表现——所有制变迁的研究放在了最为突出的位置，其对各类经济问题的分析，也首先是为研究人类社会未来的制度变革趋势服务的；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则注重于各类经济现象的解释，其涉及到的所谓“制度”往往只是局限于经济活动领域内的一般组织制度，并不具备什么社会政治意义，而且也只是为了解释经济现象服务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189.

② [美]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5.

③ [美]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前言第5页．

第二，研究目标涵盖的时段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则是针对较短时期内或者就现当代的各类经济活动现象的。如果形象地说，则政治经济学是在分析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演绎未来；而经济学则是在分析历史现象的基础上解释现状。

第三，两门学科主要研究目标的不同带来了动机上的差异。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可运用于改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性；而经济学则只具有改善现时的社会经济活动效益的目的性。

综上所述，由于主要研究目标的不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具有质的区别的两门不同学科，其各自的研究方向（目标）是不能互相混淆的，两者的学科名称当然也不应互相取代。

此外，受各自学科不同研究目标的影响，使得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各自研究方法也具有了不同的形态，即政治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法，而经济学则侧重于现象描述法。对此，有的学者已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①在此，我们无需再就研究方法本身多作论述。但联系这两门学科的主要研究目标差异来简略地论述一下研究方法不同之原因所在，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有一句经典论述：“……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以抽象力来代替二者。”^②然而，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运用“抽象力”呢？我们认为，这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所引发的。因为既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研究未来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运用以往的历史经验材料，也不能从现存的政治经济现象描述中直接得出有关未来的政治经济变化趋势的结论，所以，即使拥有的历史经验材料再详细，用于现象描述的公式、模型再精巧，所能得到的仍只不过是关于过去与现在的现象综述，若不运用人类思维的“抽象力”去探究事物的内在联系，一切有关未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论述，都不过是一些妄论空谈。

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毕竟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因此，为了真正地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与现在的表象材料之后，研究者还必须运用自己的“抽象力”，才能最终取得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以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只能是抽象演绎法。当然，此处说的只是“主要”方法，这里丝毫没有排除现象描述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运用的意思。但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

①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② 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63。

者若不能成功地运用抽象演绎法，则其最终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完全失败或者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不自知；二是实质上走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若其初衷是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这至少是一种可悲的失误。

反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其“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①而经济数据的累集本身就是一种对过去现象的综合，因此，经济学研究以现象描述法为主，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与经济学解释经济现象的主要研究目标也是相一致的。不过，虽然通过经验的积累或曰现象的综合得出指导人们实践的结论，是人们常见常用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一般难以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

当然，这只是就（经济学）理论研究而言。在现实中，人们的行事一方面受到客观环境和认识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往往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必须在认识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后再去进行实践，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一点对于微观经济活动来说表现得尤为显著，即人们所进行的绝大多数微观经济活动，都是依据自己所拥有的经验材料行事的。正是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形，为以现象描述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当然我们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现象描述法，并不是要排除其运用抽象演绎法的可能性，但在大量的模型、公式和图表数据海洋中，经济研究者运用抽象演绎法的天地是非常狭小的。

正是鉴于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差异的认识，加之受自己的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我们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有关统计数据的应用将尽量地予以从简，至于被经济研究者所看重的模型、公式、方程等表述形式则更是难以看到。这可能会被许多具有深厚功底的专业学者们所鄙视，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却可以让读者更易了解我们的著述思路。

* * *

如果我们追寻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二者不仅曾混为一体，而且还造成了许多延续至今的争论。因此，回顾历史，廓清二者的区别及彼此间的联系，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各自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虽然一生仅发表一部政治经济学（实际上还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内容的）著作——《国富论》（近年来也有人认为斯密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也可以视为经济著作，不过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说），但却使后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视其为较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而

^① [美]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十六版）. 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5.

经济学研究者也将其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①这种共尊一祖的现象，不仅使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有了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是造成此后两门学科间多年恩怨纠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评论，《国富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不过马克思将其中的经济学部分视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巧妙混合的著作。而我们可以看到，斯密之后就几乎再无人能写出这种将两门学科巧妙混合的著作了。这是因为，实际上斯密之后的学者逐渐开始了有所侧重的研究。马克思的研究使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真正开始分道扬镳，但有关名称的问题依然存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济学”一词往往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简称）。对于这两门学科的争议，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往往只注重阶级斗争的背景，而不能看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立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各自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同所致。

从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的特征来分析，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前提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非此，就谈不上任何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其主要的研究目标，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一点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分析中就可以看到。

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状况但还未能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们首先看到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前景，从而造就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盛。然而当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理想制度观念，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中日益坚定，这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末日也就临近了。

我们知道，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其在“劳动”的价值和商品生产价格与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不过，我们认为李嘉图学派（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破产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资产阶级学者们一旦得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终理想制度的结论之后，其实质上也就等于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因为如果人类社会确实已经创立了不变的或者说是永恒的理想制度，当然也就无需再去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了。这样就势必会导致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走向末路。

不过，虽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结了，但以解释经济现象为主要

① [美]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1。

研究目标的经济学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度内不断地得到发展并延续至今，然而这已是与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门学科了。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下去的，则是马克思所进行的创造性研究。

从马克思的研究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远在写作《资本论》的许多年前，或者说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初，马克思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其最终将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当然，信念本身不能代替科学的研究，但却可以使研究者牢牢地抓住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目标。从这一点来讲，任何一个研究者，若没有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不断发生变化而不是凝固的信念，是无法成功地进行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更进一步地说，甚至抱着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可能会变、也可能不变的观点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其最终滑进经济学领域的可能性也是更大一些。

这是因为，用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实例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永恒性，不仅简单省事，而且也确实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而要想在历史与现实材料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理论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这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则是一项往往需要探索者穷其一生精力去进行艰苦研究的工作。马克思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毕其一生却仍未能最终完成自己预定的研究工作，这正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无比艰难性的最真实的例证。

为了解析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不能不穷追各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联系。由马克思进一步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历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不懈追求的成果，也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当一位经济学研究者将其关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观点，以及名为价值实为价格的理论，用于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反对劳动价值论时，实际上是走错了路、进错了（学科之）门，因此被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也不算冤枉。不过，若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因此而对经济学不屑一顾，轻率地试图用政治经济学去涵盖经济学，也必然会使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陷入困境。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流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一直扮演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角色，但实践却证明，其是一种双重失败的理论。对于这种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我们以后还会一再地进行评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有人试图直接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去分析、指导个人或企业等方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其必定会是碰壁连连；若再把这类做法也称为经济（学）研究，则只会让经济学研究者视之为迂腐，并使得政治经济学研

究陷于庸俗之中。

简言之，由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个主要研究目标各不相同的学科，因此，在尚未分清这两门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之前，就轻易地挪用各自不同的基本原理去反驳、评价另一门学科的观点，只会导致一场无休止的且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乏味争吵。

* * *

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门有着本质区别的学科，但丝毫没有隔断两者联系的意思。相反，我们认为只有在区别中看到联系，在联系中认清区别，才能真正地理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

在政治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对现存的且在世界上仍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究竟是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还是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认知上。不同的认知，正是两门学科间联系的表现，不过，从科学研究上来看，这种联系是非常不平衡的。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讲，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观点，是必须用科学的理论分析来予以证明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标语、口号或者道德上的抨击都是无济于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对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的事实真相的揭露，也主要是起到了鼓动被剥削、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资本统治的作用，而并不是一种剥削制度必然会被替代的理论证明。因为，虽然社会性质有所区别，但几千年来，劳动者受剥削的事实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宣示奴隶受剥削的苦难并不是奴隶制必然灭亡的理论证明；描述农民受剥削的悲惨也不是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理论证明；同样地，揭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秘密，也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终极理论证明，而只是完成这种理论证明的前期理论准备工作。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只有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最终完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替代的理论证明。当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以封建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分析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会替代封建主义。同样的，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证明，也必须落实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理论分析研究之上，而不能仅限于对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秘密的揭露上（需要注意的是，现当代经济学家们正是用不依据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也能揭示资本剥削秘密的说法来指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无用的、多余的。）